

## On Students' Language Adaptation in PMI Classroom

See-Ho KWOK

###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n PMI seldom investigate PMI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 learning as their main concerns are other aspects like teaching, curriculum, and school administrative support. Essentially, PMI is a reform in classroom teaching language. Only when teacher-student verbal interaction in PMI classes is included in the investigation can the issue and its core problems be scrutinized and better understood. This article uses a series of video recording of primary one PMI classes to probe into students' language performance, like word selection and sentence structure selection. An analysis is also carried out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cative barriers (including silence, omission, transcoding, all arising from avoidance) faced by P1 students at their adaptation stage. Suggestions for adjusting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made.*

*Keywords: teaching Chinese in Putonghua (PMI); classroom language; language adaptation*

## 香港早期聾人教育與香港手語源流的關係

施婉萍、路駿怡、盧瑞華、朱君毅

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

本研究透過搜集資料和採訪人物，追溯香港早期聾人教育發展情況，探討當時聾校語言政策與香港手語源流的關係，以及聾人對不同教學語言的看法。根據採集所得資料，香港的聾童教育最早可追溯至1935年成立的一所聾校。雖然該校禁止師生使用手語，但基於溝通需要及本能，聾童之間自自然然發展出一套以手部動作表達意思的溝通方法，形成手語的雛形。戰後聾校數目逐步增加，當中部分聾校引入了相信是源自南京或上海的手語為教學語言，因此香港手語其後的發展深受南京或上海手語影響。我們在採訪中亦發現，無論是從口語學校或手語學校畢業的聾生，絕大部分都認為手語教學對他們的學習有幫助。如歷史能夠重演，他們都渴望健聽老師能用手語授課。

關鍵詞：香港聾童教育；香港手語；教學語言；手語源流

本文探討香港早期聾人教育及手語源流的關係，目的有三：（1）關於香港早期聾人教育及手語源流的情況，坊間只有零碎資料，缺乏有系統的記載，本文綜合各方資料，對香港聾人教育發展及手語源頭作較全面的描述；（2）不少國家的手語發展和聾校的設立有緊密關係，本文探討香港手語的發展是否同樣地受聾校語言政策影響；（3）香港早期的聾校分別採用了手語為主及口語為主兩類教學法，本文綜合了受訪聾人對兩類教學語言的看法和意願。

### 文獻回顧

過往不少研究指出，聾人一有聚頭的機會，便會自自然然發展出手語來。聾校的建立，尤其是附設宿舍的聾校，是締造手語的其中一個有利環境（Groce, 1985; Senghas, Senghas, & Pyers, 2005; Winzer, 1993）。例如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共和國，在1977年才成立具規模的聾校。在此以前，大多數聾人分散各鄉各縣，甚少碰面，個別聾人或會用簡單手勢跟健聽家人溝通，但整體上沒有通用全國的手語。聾校成立以後，來自

四方的聾童凝聚一起，即使校內老師主要以口語教學，但聾學生之間沒多久便創造出簡單的手語來，經過短短十數年，原本簡單的手語已發展成爲一套詞彙豐富、通用全國的手語（Senghas, 1997; Senghas et al., 2005）。又例如美國手語有相當多詞彙源於1817年由Thomas Hopkins Gallaudet牧師及Laurent Clerc所建立的第一所聾校——The Connecticut Asylum at Hartford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Deaf and Dumb Persons（Lane, 1984）。Laurent Clerc是來自法國的聾人，到美國創校時引入了法國手語，因此現在美國手語仍保留有法國手語的影子（Woodward, 1978）。相類的情況亦在亞太地區出現。例如台灣手語主要源自20世紀初日佔時期日方在台北及台南成立的兩所聾校（Smith, 2005）。至於澳洲手語，自18世紀末開始，大量英國移民湧入澳洲，當中包括會打英國手語的聾人，他們當時散居澳洲各地，形成零星的手語群，直到1860年第一所聾校建立，這些帶有英國色彩的手語才在一個較集中的環境下逐步發展成現今的澳洲手語（Johnston & Schembri, 2007）。以上事例說明了手語的出現和發展跟聾校有密切關係。就算聾校的教學語言並非手語，聾學生長時間的接觸亦可以成爲孕育手語的合適環境。

至於香港聾人教育跟手語發展的關係，目前坊間只有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1987）出版的《香港手語源流及發展》略有提及。該書資料主要來自八位20世紀60年代中至80年代初從事聾人教育的受訪人士。書中指出，在二次大戰後有兩位來自中國內地的聾人夫婦在香港成立了華僑聾啞學校，他們引入了相信是源自上海／南京一帶的手語，直接影響了香港聾人社群日後手語的發展。不過，華僑聾啞學校並不是當時唯一的聾校。香港第一所聾校早在1935年成立，該校的聾生究竟有沒有發展出手語來？和華僑聾啞學校同期的其他學校，手語使用情況又是怎樣呢？這些問題，書中未有詳細記載。另外，該書的受訪者中沒有60年代以前的前線老師或聾學生，因此1935至1960年聾生之間實際使用語言的情況仍然是缺乏資料的。

##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資料來自以下兩方面：

1. 文字性的資料，包括：
  - 政府刊物，例如政府年報、有關部門的年報、統計數字
  - 有關香港手語及聾人教育的學術文章
  - 其他資料，例如剪報、《香港年鑑》、聾校校刊、網上資料等等
2. 聾人問卷調查及訪問；問卷包括封閉式問題和開放式問題：
  - 封閉式問題，例如：你曾經在哪所聾校就讀（提供各聾校的名稱作選擇）？你學校的老師用哪一種方式教學（提供手語、口語、手口語、發音手形及

其他作選擇）？你能否明白老師的教學？（提供非常不明白至非常明白五個選擇）

- 開放式問題，例如：你是從哪兒學到手語的？你認爲香港手語是從何而來的？爲甚麼香港不同派別的聾人有不同的詞彙？

我們訪問了22位在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就讀香港聾校的聾人，<sup>1</sup>共12男10女，接受訪問時他們年齡介乎38至77歲之間。<sup>2</sup>另外，我們亦訪問了一位曾使用手語教導聾童的健聽老師。

## 香港聾童教育簡史

按搜集得來的資料，香港開埠以來曾開辦過的聾校及聾童教育機構有數所，表一列出了它們的名稱、辦學模式、辦學年分等資料。<sup>3</sup>

香港的聾童教育，最早可追溯至1935年由英國聖公會成立的真鐸啓暗學校，創校時只有6名學生，戰前人數增加至40人左右。該校於大戰期間停辦，1948–1949年復課時學生約有14人。這個偏低的數字反映出當時聾童失學情況嚴重。戰後社會及經濟漸趨穩定，加上聾校需求殷切，在短短二十多年間，聾校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有政府資助的，亦有私辦的，規模大小不一，高峰時期有十數所之多。

1970年之前，殘疾兒童的教育由社會福利署（以下簡稱社署）管轄。當時社署對聾童教育的政策，主要是逐步增加聾校學額，教學上未見有特定規劃。<sup>4</sup>從另一角度看，有可能正因為政府沒有特定的聾童教育政策，所以這段時期的聾校在辦學模式及教學語言方面有相當彈性。早期建立的真鐸啓暗學校主張以口語教學，老師都是健聽的；同屬早期建立，規模相當的華僑聾啞學校則由聾人創辦，使用手語教學，老師有聾人亦有健聽者；<sup>5</sup>其後成立的曉莊聾啞學校和香港聾啞協會學校，亦以手語教學爲主，聘有健聽及聾人老師；而啓暗聾啞學校的健聽老師，則同時使用手語及口語。因此，客觀來說，相比起現時清一色只有口語主導的教學法，當年的聾校至少爲聾童提供了較多元化的教學語言選擇。

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年政府對聾校教學語言的態度是相對開放的。1960年，爲了解決聾童學額嚴重不足問題，<sup>6</sup>政府實施了兩項政策：（1）撥地開辦啓聾學校，以作真鐸啓暗學校的分校，奉行口語教學；（2）與此同時，社署成立了兩所聾童會，爲無法入學的7–13歲聾童提供訓練及康樂活動。值得注意的是，聾童會是用手語教學的。根據文獻及採訪所得資料，聾童會聘用了不少曾經在華僑聾啞學校任教的聾人及健聽老師，<sup>7</sup>這些由華僑轉過來的老師，除了教聾童外，亦會向其他不諳手語的老師傳授手語經驗。我們認爲，聾童會採用手語教學，反映了政府內部對手語教學的成效持正面態度。事實上，在1960年的政府年報中，政府清楚列明真鐸啓是采用口語教學

表一：香港開埠以來開辦過的聾校 / 聾童教育機構

聾校名稱	辦學模式	辦學年分	教學語言	開辦級別	受訪者報稱就讀年分
真鐸啓暗學校	教會團體 開辦， 政府資助	1935 年開辦（1941-48 年因戰亂停課），2004 年改名真鐸學校，開始停收聾生，逐步轉型為主流學校	口語為主	幼稚園至 中五	受訪者甲：1947-1950 受訪者乙：1948-1956 受訪者丙：1953-1962 受訪者丁：1957-1968 受訪者戊：1970-1976 受訪者己：1974-1979
華僑聾啞學校 <sup>8</sup>	私營	港島原校於 1948 年開辦，九龍分校於 1956 年開辦，兩者同於 1975 至 1976 年間停辦	手語為主	幼稚園至 中三	受訪者甲：1953-1958 受訪者乙：1953-1968 受訪者丙：1957-1962 受訪者丁：1958-1970
啓聾學校 <sup>9</sup>	政府資助	1960 年開辦，2006 年停辦	口語為主， 少許手語	預備班至 小學	受訪者甲：1966-1974 受訪者乙：1970-1977
曉莊聾啞學校 <sup>10</sup>	教會團體 資助	1961 年開辦，1974 年停辦	手語為主	幼稚園至 中二	受訪者甲：1956-1960 受訪者乙：1957-1968 受訪者丙：1959-1966 受訪者丁：1966-1969
聾童會 <sup>11</sup>	政府社會 福利署	1960 年開始，前後成立了 6 所，1977 年全面停辦	手語為主	小學 (7-13 歲)	受訪者甲：1960-1968 受訪者乙：1970-1977
啓暗聾啞學校 <sup>12</sup>	私營	1961 年開辦，1975 至 1976 年結束	手語及口語 並用	幼稚園至 小學	受訪者甲：1960-1966
香港聾啞協會學校 <sup>13</sup>	私營	1962 年開辦，1969 年 左右結束	手語為主	小學	受訪者甲：1960-1968
路德會啓聾學校 <sup>14</sup>	政府資助	於 1968 年成立至今 (同一團體在 1965 年 另外成立了路德會聾人 夜校，結束年分不詳)	口語為主， 少許手語及 暗示性發音 手形	預備班、 小學至中學	受訪者甲：1968-1977 受訪者乙：1969-1978 受訪者丙：1971-1987 受訪者丁：1977-1990
嘉諾撒達言學校 <sup>15</sup>	政府資助	1973 年開辦，2007 年 結束	口語為主	小學至中學	受訪者甲：1975-1987 受訪者乙：1977-1982

- 註：i. 辦學模式方面，綜合政府各類年報的紀錄，只有真鐸及啓聾兩所姊妹學校接受政府額外財政支援。另外，1954 及 1955 年的社署年報及 1955 年的政府年報提及，政府曾考慮撥資源擴建華僑聾啞學校以收容更多聾童，後來計劃告吹，撥款最終歸入英國聖公會轄下的真鐸用以興建啓聾為姊妹學校。年報沒有交代放棄資助華僑的原因。假如當日接受政府撥地的是華僑，相信香港的聾人教育歷史必然會改寫。
- ii. 辦學年分方面，《真鐸啓暗學校金禧紀念特刊：1935-1985》（真鐸啓暗學校，1985）記載，學校因大戰停課，期間校長李綠華前往英、美深造聾兒教育六年。由於當時手語語言學仍未出現，全球的聾童教育理念仍以口語為主，相信李校長當時進修的主要是口語教學法。
- iii. 開辦級別方面，有些聾校開始時只有幼稚園及小學，到後期才發展中學部，在表內會簡略以「幼稚園至中學」表示。至於聾童會，據 1971 年《香港年鑑》（頁 90）記載：「由於聾童學校學位不足，頗多聾童無法進入學校，故社會福利署以辦理六間聾童會，為無法入學之七歲至十三歲聾童供應訓練及康樂活動」（華僑日報，1950-1992）。
- iv. 受訪者就讀年分方面，本表均按受訪者填報年分如實列出。有部分受訪者報稱入讀聾校年分與文獻資料有出入，例如真鐸有兩名受訪者報稱入學年分為 1947 及 1948 年，但根據文獻當時真鐸仍未復課。另外，啓聾受訪者甲與真鐸受訪者己為同一人，啓聾受訪者乙與達言受訪者乙為同一人，啓暗受訪者甲與曉莊受訪者丁和真鐸受訪者戊為同一人。

法，而華僑是使用手語的，雖然只是短短一句，但足以反映政府理解兩者的區別。更值得注意的是，1961-1964 年的政府年報同時匯報了啓聾學校擴展的情況和聾童會數目逐漸增加（Hong Kong Government, 1954-1964）。基於這些零碎史實，我們推測，當時社署即使沒有積極推動，也算是容許口語及手語教學兩種模式同時平衡發展的。

20 世紀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香港的聾人教育出現了明顯變化。首先，隨着獲政府資助的啓聾學校（1968 年）和達言學校（1973 年）相繼落成，加上政府於 1972 年起推行六年免費強迫教育，收費相對高昂的私營聾校無可避免遭逐步取締。<sup>16</sup> 與此同時，特殊教育服務的責任亦慢慢由社署轉歸教育署管轄（Yung, 1997）。聾童會是隸屬社署的，在這個轉型中自然日漸式微。不過，在 70 年代，對聾童教育影響最深遠的政策，莫過於融合教育的實施。1968 年，政府正式確立「殘障兒童應儘可能跟一般兒童接受同樣的教育」<sup>17</sup> 的特殊教育方向；1969 年，政府成立了第一個設於健聽學校內的弱聽班，<sup>18</sup> 為日後的融合教育揭開序幕（Education Department, 1961-1972）。為了增強支援聾童使用剩餘聽力，政府自 1972 年起為所有聽障學童免費提供助聽器，1973 年發展語言治療服務（Yung, 1997），其後在 1977 年發表白皮書，正式確立特殊需要兒童融合教育政策方針，分階段取代 40 年代起沿用的隔離教育政策（Hong Kong Government, 1977）。1994 年起，香港開始有聾童接受人工耳蝸手術（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2009）。現時每年有不少學齡前的聾童進行手術，手術後他們大部分會到主流學校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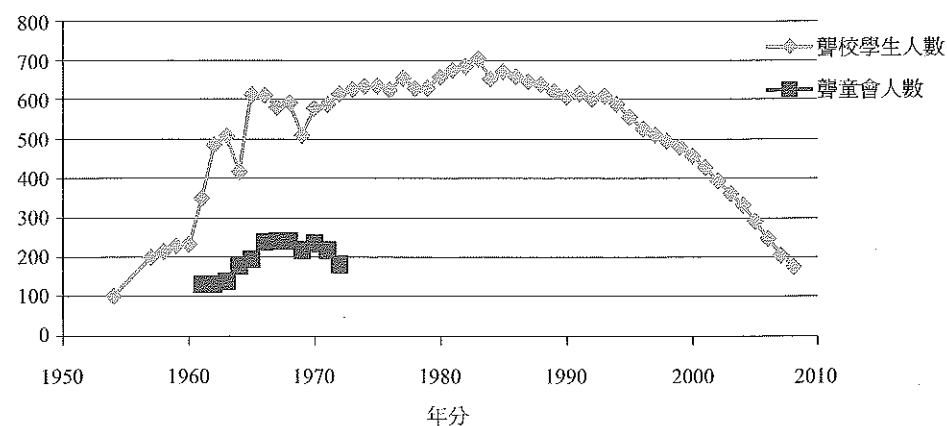
這一連串的歷史發展，對香港聾童教育主要有兩方面的影響。首先，入讀聾校的學生數目一直下跌，聾校收生不足，陸續倒閉，聾校的數目由 60 年代的 7 至 8 所，10 年間減至 4 所，2008 年只剩 2 所。<sup>19</sup> 聾校人數方面，由高峰時期的 700 多，大幅度下降至 2008 年的 176 人，目前全港有過千名不同聽障程度的學生入讀主流學校。<sup>20</sup> 圖一顯示了 1954 至 2008 年入讀聾校及聾童會的人數。

另一個深遠的影響是，在口語教學主導及融合政策的前提下，聾老師及手語在聾童教育中難以再扮演昔日的角色。私營聾校倒閉後，剩餘的聾校基本上奉行口語教學，聾校學生接觸到手語的機會大大減少，更遑論後期入讀主流學校的聾生了。

### 聾校跟香港手語源流的關係

我們在這部分探討香港早期聾校跟香港手語源流的關係。我們首先簡介聾校教學語言跟手語的關係，然後集中分析香港最早建立的兩所聾校——真鐸啓暗學校及華僑聾啞學校——手語使用的情況，接着討論華僑跟其他聾校手語的關係和近年香港手語使用的狀況，最後是展望香港手語未來的發展。

圖一：1954-2008年入讀聾校及聾童會的人數



註：數據綜合自社署年報（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1948-1979）、教育署年報（Education Department, 1961-1972）、政府年報（Hong Kong Government, 1954-1964）和香港統計年報（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82-2009）。其中 1963 至 1968 年教育署跟社署的數據有少許出入，由於社署的紀錄有每所聾校的人數，資料較詳盡，我們以社署的數據為準。聾童會在 1977 年全面關閉；由於服務需求下降，自 1973 年起聾童會的服務對象開始擴展至聾的成人及智障人士，因此從該年開始，社署有關聾童會的受助人數不再純粹是聾童，所以圖中僅列出了聾童會截至 1972 年的人數。

### 聾校教學語言跟手語的關係

回顧全球聾人教育歷史，教學方針主要分為兩大派別——口語教學及手語教學。兩種教學法哪一種較有成效，自 18 世紀以來一直是聾人教育爭論的焦點，兩派的支持者曾長期處於敵對排斥的局面（Lang, 2003）。20 世紀 70 年代起，語言學家開始有系統地研究手語的特質，逐漸證明了手語的語言地位及其對聾童發展的好處，教育界才發展出手語和口語雙語的理念，為聾童教學提供一個揉合手語和口語優點的新方向（Grosjean, 2001）。<sup>21</sup>

在這個歷史背景下，香港早期的聾校，大致可區分為口語教學及手語教學兩類。所謂口語教學，是指透過訓練讀唇和使用剩餘聽力的技巧，協助聾童掌握口語，並以口語為單一教學語言。採用口語教學的聾校，認為融入健聽社會是教育的最終目標，所以學習口語在聾童教育中極為重要。由於擔心聾童學會手語以後會影響學習口語的成效，<sup>22</sup> 這類學校通常會嚴禁或不鼓勵老師在任何情況下跟學生用手語溝通。真鐸啟喑學校、啟聲學校、路德會啟聾學校<sup>23</sup> 和嘉諾撒達言學校同屬這一類，但實際執行校規時各校的鬆緊程度不一。有些老師會用體罰阻嚇學生，<sup>24</sup> 亦有老師對學生私下用手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我們的調查中，所有就讀這類學校的受訪者都表示學生之間暗地自創和使用手語的情況十分普遍。其中一位在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入讀這類聾校的學生說了以下一番話：

……在宿舍裏，有學生負責在門口把風，其他學生就用手語談天，一看到老師巡房，大家馬上假裝睡覺，老師一走，又輪到另一位同學把風，一見到老師的蹤影就通知大家裝睡……

另一方面，在這類聾校，有部分老師會因為體恤學生對手語的渴求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位在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就讀口語聾校的受訪者這樣憶述：

有時校長不在附近，老師可能會加上少許手勢，例如用手指一些物件，擺動手掌說不，或用手拿起一些物件來表達意思，但校長一經過，老師馬上把手放下。

另一位在 70 年代就讀同一所聾校的受訪者也說：

老師跟我們用手語談話，一看到校長經過，便馬上把手放下改用手語。

由以上事例可見，禁止手語的校規並未壓抑到聾童從內而發渴望使用手語的自然傾向，不少前線的健聽老師亦同樣意識到使用手語的必要。

至於手語教學，是指老師以手語為教學語言，着重師生之間的溝通，學習口語相對次要。採用手語的學校，課堂內外，師生之間和學生之間都主要用手語溝通。這類學校一般都聘有聾人老師，而且多數採用已存在的手語，學生自創手語的情況較少，就像美國第一所聾校外借了不少法國手語的情況一樣。華僑聾啞學校、曉莊聾啞學校、聾童會和香港聾啞協會學校都屬於這一類（這數所學校的老師使用了不少中國內地的手語，下文會詳述）。由於師生上下經常使用手語，學生的手語能力較強。至於啟喑聾啞學校，則口語及手語並用。

總括而言，香港早期的聾校採取了口語、手語或兩者兼備的教學政策。不過就算是口語為主的聾校，學生之間亦有很大機會發展出手語來，這跟文獻回顧中所提及的尼加拉瓜共和國手語有共通之處。為了找出香港手語最早期的源頭，以下的討論會集中在香港最早成立的兩所聾校——真鐸啟喑學校及華僑聾啞學校；我們會綜合兩所學校受訪者的憶述，探討聾學生手語使用的情況。

### 真鐸啟喑學校

當談及香港手語的源流時，多數人只會提起華僑聾啞學校，甚少會想起禁用手語的真鐸啟喑學校。如上文所述，我們認為有必要查考真鐸早期學生使用手語的情況。真鐸建立於 1935 年，為香港最早成立的聾校，雖然校規禁用手語，但學校附設宿舍，而且學生留宿比例在 1967 年前更高達 100%（真鐸啟喑學校，1995），<sup>25</sup> 因此，學生在朝夕共對的情況下發展出手語來是不足為奇的。<sup>26</sup>

我們訪問了六位不同時期就讀真鐸的畢業生，其中四位於 20 世紀 40 至 60 年代入學的受訪者曾入住宿舍。他們表示學生之間通常是使用手語溝通。早期真鐸學生使用的手語，不少是學生自創的，而宿舍生活明顯為學生提供了良好的空間自創和交流手語。一位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中入讀真鐸的受訪者表示：

學生有自創手語，例如用手模仿在電視上看到的東西。

他又說：

我高年級的時候，需要照顧低年級學生起床穿衣……溝通都是用手語的，我就這樣把手語傳開去。

另一位在 50 至 60 年代就讀真鐸的受訪者說：

當老師一離開宿舍，我們便興高采烈地打手語……我們都是自由發揮……像玩耍一樣……老師一來，我們便假扮說話，老師一走，我們又再打手語，所有學生都是這樣的……用了手語，學生間溝通得很容易。

他更表示：

我的手語是我在真鐸讀書時學來的。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早期真鐸的學生之間已經流傳着一套自創的手語，可以視為香港聾人自發衍生出來的手語系統，略具手語雛形。我們認為，這套手語系統跟下文的華僑派手語，對香港手語的成型及發展扮演着同樣重要的角色。

## 華僑聾啞學校

華僑聾啞學校成立於 1948 年，由聾人陳卓祥、黃振東夫婦創辦，其後在 1956 年再辦分校。陳卓祥來自南京（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1987），畢業於上海福啞學校（見華僑日報 1962 年《香港年鑑》）。南京跟上海地理位置非常接近，因此陳校長的手語，應該是南京及上海一帶的中國手語。<sup>27</sup> 華僑學校的其他老師，不論是聾的或是健聽的，都跟校長一樣以手語教學。據四位華僑受訪者憶述，聾生都是直接從老師身上學到手語的。

毫無疑問，從華僑聾啞學校引入的南京／上海手語，對香港手語的成型及發展有極深遠的影響。首先，華僑屬於早期建立的聾校，雖然屬於私營，但規模一度與真鐸啓喑學校相若，培育出為數不少的畢業生。由於是直接從老師身上學習手語，不同

年級的學生手語大致相若，換言之，相比真鐸派的手語，華僑派手語在詞彙及文法上相對穩定。為數相當的華僑學生畢業後，活躍於聾人社群，他們的手語，相信比其他個別聾校學生自創的手語更具認受性。事實上，在我們訪問的過程中，不少非華僑的受訪者都稱讚華僑畢業生手語純熟，是他們模仿學習的對象。

華僑派的手語，不論是在教職員或學生的層面上，都影響了其他聾校的手語。曉莊聾啞學校的創辦人張建勳先生（健聽），原本是華僑的老師，自立門戶後繼續以華僑派的手語教學。後來一位從曉莊畢業的聾生，到了路德會啓聾學校當老師，相信他的手語影響了不少啓聾的學生。此外，社署的聾童會聘請了數位華僑的老師，因此聾童會的手語跟華僑派基本上同出一轍。至於聾啞協會學校的手語派別，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不多，我們只知道聾校長孫民生曾在瀋陽辦過聾校，另外一位姓譚的聾老師則來自廣州（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1987）。不過有受訪者指出，聾啞協會學校師生的手語同屬上海一派，跟華僑的手語感覺上很類似。

在聾學生的圈子中，亦不難看見華僑派手語的影響。一名真鐸受訪者稱，他在街上認識到一些華僑的學生，跟他們學了不少手語。另一位真鐸受訪者說他有一位姊姊就讀華僑，從而認識不少華僑學生。1973 至 1975 年間前後有三所私營聾校倒閉，當中包括華僑及曉莊兩校，不少懂得華僑派手語的聾生改讀啓聾，其中一位啓聾的受訪者明確指出，讀小學期間來了一位懂得手語的轉校生，從他身上學到了手語。同樣地，達言的受訪者也說印象中在學校開辦初期，小學部有一些由聾童會和曉莊轉過來的學生。這些學生之間的交流，令華僑派手語進一步影響到其他聾校的手語。因此，華僑派手語的影響範圍並不局限在華僑學校的兩所校舍內。

不少聾學生在學期間或畢業後，有參與聾人團體的活動。這些聾人聚會令不同聾校背景的聾人有機會交流手語，例如有真鐸的受訪者告訴我們，他讀書時代時常參與香港聾啞協會<sup>28</sup>的活動，從中學到手語；亦有受訪者說讀書時期學到一套手語，但畢業後認識了其他聾校的畢業生，又學了他們的手語，棄用了部分自己原來的手語。我們認為，由真鐸學生自然衍生出來的手語，跟華僑派手語及其他個別學校發展出來的手語，慢慢經過一個交流、磨合的過程，香港手語開始成型，在這個過程中，華僑派的手語擔當着重要的角色。Woodward (1993) 的研究指出，香港手語的基本詞彙中有 66–68% 跟上海手語相同，正正反映出華僑派手語對香港手語的影響。

華僑派手語，在中年或以上的聾人群體中，至今仍舉足輕重。至於年輕一代，它的影響已日漸式微。絕大部分三四十歲以下的聾人，畢業於以口語教學的聾校，他們使用的手語，有的是從年長學生那裏學來的，也有同學間自創的。另外，在 60、70 年代，通訊落後，聾人聚會（例如聾會活動）是聾人彼此聯絡的必然選擇。有受訪者向我們表示，當年即使付不起車資，寧願步行數小時亦要千里迢迢參與聾人間的活動。隨着社會變遷，資訊發達，聾會活動對年輕一代的聾人吸引力銳減，年輕聾人接觸

華僑派手語的機會更少。至於入讀主流學校的聾生，基本上不懂手語。所以，年輕一代的聾人能操流利手語的不多，他們打的手語，跟年長的有頗大差別。在聾校學生人數持續銳減的情況下，除非政府、聾人團體和學術界仿效外國保育少數族群瀕危語言的措施，積極推廣手語，否則，我們對香港手語今後的發展實在不甚樂觀。

### 聾人對教學語言的看法

在問卷調查中，有些封閉式的問題是關於受訪者對教學語言的看法。問題包括：

1. 聾校的健聽／聾人老師是用甚麼教學語言的？
2. 你能明白老師授課的內容嗎？
3. 你希望健聽／聾人老師使用甚麼教學語言呢？

部分受訪者回答以上問題時額外加上了自己的見解。本部分會先列出三條問題整體答案的比率，然後再援引受訪者的分享來詮釋這些數據。

表二列出了聾老師及健聽老師所使用的教學語言。大體上，聾老師都是使用手語的；健聽老師的教學語言，則視乎聾校本身的政策，亦有部分健聽老師會在說話時夾雜一些手語（即表中的「手口語」<sup>29</sup>）。

第二條問題關於老師的教學語言是否能令受訪者理解課堂內容，結果見表三。九位曾經被聾人老師用手語教授的受訪者中，超過一半表示他們能明白上課的內容。至於聾人能否理解健聽老師的課堂，明顯視乎老師的教學語言。整體來說，使用手語的健聽老師最能提高學生的理解，其次是邊說話邊打手語。至於純口語教學，只有極少數人表示能明白老師授課的內容。

第三條問題是，如果時光能倒流，受訪者最希望曾教過他們的老師使用甚麼語言來教學。如圖二顯示，絕大部分受訪者都希望老師使用手語教學，二十多位受訪者中沒有一人希望老師純粹以口語教學。

以上三條問題的調查結果顯示，手語較能幫助學生理解課堂內容，也是受訪聾人心中較佳的教學語言。在受訪者眼中，純粹口語教學的問題，在於學生難以理解課堂內容：

老師只用嘴巴講課，我甚麼也看不明白……他們打點兒手勢也沒有用……我跟老師說我看不懂唇語，問他們可不可以用手語來教我們？他們堅決地拒絕了。（女受訪者，40年代末 50年代初就讀口語聾校）

老師用口語教書，我有時看得懂，有時看不懂。（女受訪者，60年代末至 70年代末就讀口語聾校）

表二：聾老師及健聽老師所使用的教學語言

聾校名稱	聾老師			健聽老師				
	手語	口語	手口語	暗示性發音手形	手語	口語	手口語	暗示性發音手形
真鐸啟聾學校		✓				✓	✓	
啟聾學校						✓	✓	
路德會啟聾學校	✓		✓	✓	✓	✓	✓	✓
嘉諾撒達言學校						✓	✓	
華僑聾啞學校	✓				✓	✓	✓	
啟聾聾啞學校					✓	✓	✓	
曉莊聾啞學校	✓		✓		✓		✓	
香港聾啞協會學校	✓				✓			
聾童會	✓				✓			

註：i. 據一位受訪者表示，真鐸約於 1971 至 1972 年間曾聘用一名聾人當老師，該名老師在香港主流學校長大，到美國讀書時學了美國手語，任教一年便離開了，期間需要跟從校規使用口語教學。

ii. 啟聾學校的老師使用口語居多，有少數間中加插少許手語。

iii. 只有一名啟聾的受訪者表示學校會聘有三至四位聾老師，其餘的啟聾受訪者只記得有健聽的老師。

iv. 達言學校的健聽老師使用口語居多，有少數間中加插少許手語。

v. 據啟聾學校唯一的受訪者表示，讀幼稚園時老師主要使用口語，小學時老師會使用手語及口語，有時會先用口語講解，再補加手語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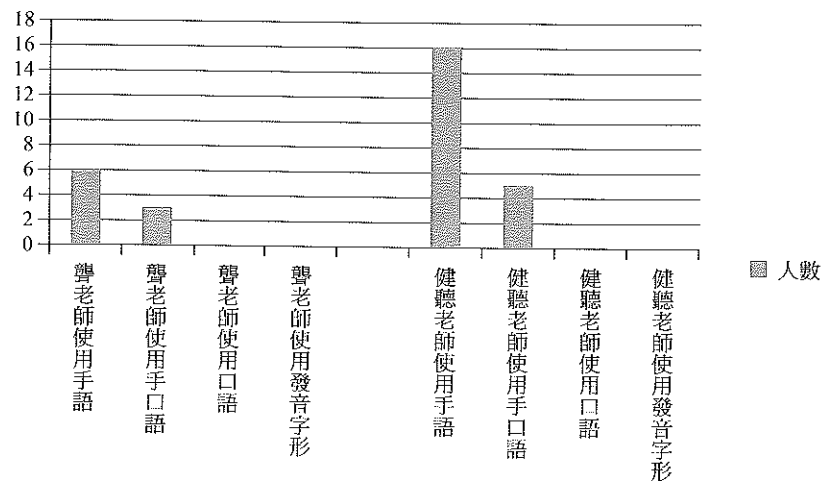
vi. 曉莊聾啞學校的健聽老師使用手語居多。

表三：受訪者對老師教學語言的理解情況

	非常明白	明白	一般	不明白	非常不明白
聾老師使用手語	1 (11.1%)	4 (44.4%)	4 (44.4%)	/	/
聾老師使用手口語	/	/	/	/	/
聾老師使用口語*	/	1 (100%)	/	/	/
健聽老師使用手語	1 (14.3%)	3 (42.8%)	3 (42.8%)	/	/
健聽老師使用手口語	/	1 (14.3%)	6 (85.7%)	/	/
健聽老師使用口語	/	1 (14.3%)	4 (57.1%)	1 (14.3%)	1 (14.3%)
健聽老師使用發音手形	/	1 (33.3%)	2 (66.7%)	/	/

\* 有一位真鐸的受訪者在讀六年班時曾跟一名僅任教了一年的聾人老師學英文，該老師是使用口語的；受訪者說他能明白老師的口語，是因為當時老師用的教材為小一程度，內容簡單。

圖二：受訪者希望老師使用的教學語言



註：圖中對聾人老師教學語言的回應較健聽的少，純粹是因為只有小部分受訪者曾試過跟聾人老師學習。沒有被聾老師教過的受訪者，我們省略了聾老師教學語言的問題。有少數聾人未跟過健聽老師上課，他們同樣毋須回答對健聽老師教學語言的期望。

老師光指着黑板上的字用口講解，我看得一頭霧水，無法掌握課文的內容。老師問我們明不明白，我點頭假裝明白，但實際上是一無所知……（男受訪者，40年代末50年代初就讀口語聾校）

課堂內容理解不足，除加重學生學習的壓力，亦間接令不少學生失去專心上課的動力：

〔調查員問：「你說上課時看不懂老師說甚麼，那麼你的中文是怎樣學來的？」〕我只能靠自己努力呀！過程艱苦得很呢！我惟有四周跟同學討教，問他們這個字是甚麼意思，那個字是甚麼意思……逐點逐點學，逐點逐點記，就是這樣子。（男受訪者，40年代末50年代初就讀口語聾校）

上課時看不懂老師在說甚麼，結果往往要下課後個別找老師用紙筆再問個清楚。（男受訪者，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就讀口語聾校）

〔調查員問：「老師用口語上課清楚嗎？」〕我們大多沒有理會老師在說甚麼，不會專心上課，多數都是自己看書學習，所以上課時只願跟同學們用手語聊天，結果常常被老師懲罰。（女受訪者，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曾就讀兩所口語聾校）

至於手語的好處，是聾生能理解課堂內容，讓他們可以透過手語進一步掌握書面語：

手語教學的好處在於每一點老師都可以詳細解釋，學生看得明白……對聾人來說，學習手語和書寫都是好的。至於學習口語，實際上聾人跟健聽人用口語溝通時，會因發音不準確而令健聽人聽得一頭霧水，用處不大。手語和書寫是最重要的。（男受訪者，50年代中至60年代中就讀手語聾校）

老師用手語教書，學生看得明白，才能學會書寫。學生單單看老師的嘴形，又怎能把意思跟紙上的文字連結起來呢？（男受訪者，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就讀口語聾校）

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不是一面倒反對口語教學的，實際上有不少聾人表示希望手語及口語並重。換言之，問題的核心並非聾人不喜歡口語，而是他們希望老師可以用一個能有效溝通的語言來教學。

## 結論

香港聾人教育始於1935年，最早期的聾生在學校及宿舍內慢慢衍生出手語來。20世紀50、60年代聾校蓬勃發展，部分聾校引入了南京／上海一帶的中國手語，直接推進了香港手語的發展。與此同時，聾會的建立及聾人社群的活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讓不同教育背景的聾人交流手語，達至彼此切磋的融和局面。隨着70年代起助聽器逐漸改良和普及，加上政府開始推行融合政策，聾校一所接一所倒閉，先是使用手語的聾校，繼而是口語為主的聾校。現時大部分聾童都進了主流學校上學，接觸手語的機會幾近乎零。按目前情況，我們對香港手語的前景不表樂觀。

不過，我們認為更需要反思的，是昔日聾校及手語對聾童教育所起的功能，在今天的融合教育政策中是否找到替代品。過往的聾校把有聽覺障礙的兒童凝聚起來，不少昔日的同學成為了畢生朋友，聾校的舊生網絡，是大多數聾人長大後社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另外，手語不單可以輔助聾童理解教學內容，而且更是聾童間滿足溝通需要的自然選擇。現在入讀主流學校的聾童，大多是孤身上路，甚少有其他聾生作伴，亦鮮有機會接觸手語。若聾童的聽力、口語及書寫能力欠佳，溝通乏術，聾童的學業、心智及心理社交等各方面發展必然受到負面影響。因此我們認為，學習口語的同時，亦不可忽視手語的重要性。本文末段提到了受訪聾人渴望老師使用手語教學的訴求，寄望特殊教育工作者能夠理解和尊重，讓聾童能有機會在沒有溝通障礙的環境下學習和成長。

## 註釋

1. 其中一名聾人受訪者在聾校畢業後當過原校及另一所聾校的老師。
2. 我們透過朋友介紹、聾會網絡及在聾人經常流連的快餐店中尋找受訪者，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例如，香港最早的聾校成立於 1935 年，戰前第一批聾生大部分已經不在人世；又例如，某些聾校辦學時間較短，聾生數目有限，可聯絡上的受訪者因而減少。為了方便數據分析，訪問的過程需要錄影，不少聾人因此拒絕接受訪問。囿於這些限制，我們所找到的受訪者大多是活躍於聾人社交圈子的，基於他們一般都喜愛使用手語，他們對教學語言的取態有可能偏重了手語。由於我們不能排除甚少涉足聾人圈子的聾人是基於對手語持較負面的態度而選擇離群，因此，本研究對教學語言看法方面的結果未必能夠完全代表香港整體聾人的看法。
3. 1967 年第 20 回《香港年鑑》（華僑日報，1950-1992）記有一所名為「鍾善特種聾人學校」的聾校，但只出現了一次，而社會福利署年報並無提及，我們亦找不到曾就讀該校的聾人。
4. 香港政府在 1954 至 1964 年出版的年報中（Hong Kong Government, 1954-1964），社會福利的部分有獨立篇幅提及聾童教育，所記載的資料包括新建的聾校、增加了的學額等等。但由 1965 年開始，政府年報把聾童教育跟其他特殊教育類別一併記錄，此後我們無法在政府年報中再找到純粹關於聾童教育的資料。
5. 我們有理由相信，華僑聾啞學校當時在政府眼中應該是頗具規模的，因為在云云使用手語的聾校中，華僑是惟一所在政府年報中有提及的。另外，根據社會福利署年報的資料（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1948-1979），1957-1964 年間華僑兩所分校合共有學生 100-120 人，跟真鐸啓喑學校的學生人數相若，兩者相差不超過 10 人，但自 1965 年起，真鐸的學生人數才逐漸拋離華僑兩校。
6. 據 1959 和 1960 年《香港年報》記載（Hong Kong Government, 1954-1964），1959-1960 年，真鐸啓喑學校及華僑聾啞學校共提供約 200 個學額，但社會福利署的登記冊上仍有 300 個適齡聾童無法入學。
7. 根據《香港手語源流及發展》（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1987）一書，從華僑聾啞學校轉到聾童會工作的聾人老師至少有陳式豐先生、黃黨樹珍女士、古佩旋女士（聾人老師）及馮建國先生。據受訪者憶述，陳先生和馮先生都能操流利手語，另外馮先生更是出色的手語翻譯員。由此可見，社會福利署當年聘用他們轉投旗下的聾童會，很有可能是因為他們熟悉手語，而非純粹因為他們有教學經驗。
8. 據 1962 年《香港年鑑》記載，陳卓祥先生於 1948 年創辦華僑聾啞學校，1956 年辦九龍分校，這些資料跟社會福利署年報的記載大致吻合。《香港年鑑》（華僑日報，1950-1992）對華僑港島北角分校的紀錄至 1975 年為止，九龍分校的紀錄則維持至 1992 年，不過受訪的聾人均認為華僑早在 1975 至 1976 年間全面結束。教育署的年報沒有列出華僑停辦的年分，不過年報的聾校數目在 1975 至 1976 年間由 7 所減至 4 所，餘下的應該是真鐸啓喑學校、嘉諾撒達言學校、啓聲學校和路德會啓聾學校，所以我們認為華僑應該在 1975-1976 年間停辦。

9. 《啓聲學校紀念特刊：1960-2006》（啓聲學校，2006）記載，1959 年香港東區扶輪社籌募捐獻興建啓聲學校，1960 年落成，校長一職由當時真鐸啓喑學校的校長李綠華兼任，因此，真鐸和啓聲的教學法大致相近。
10. 社會福利署年報紀錄了曉莊聾啞學校的開辦及結束年分（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1948-1979）。另按 1955 年《香港年鑑》的記載，曉莊學校起初為曉莊聾啞發音班，後於 1961 年改名為曉莊聾啞學校，1972-1983 年間再改名為香港聾啞佈道團曉莊聾啞學校（華僑日報，1950-1992）。表一有關曉莊的部分以社會福利署的資料為準。
11. 按社會福利署年報的紀錄（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1948-1979），六所聾童會分別為黃大仙（1960-1977 年）、贊育（1960-1975 年）、李鄭屋（1961 年開辦，1965 年搬往大坑東，營運至 1977 年）、柴灣（1964-1972 年）、觀塘（1966 年開辦，1969 年搬往秀茂坪，營運至 1975 年）及元朗（1970-1977 年）。
12. 社會福利署的年報在 1961-1962 年開始載有啓喑聾啞學校的學生人數。我們推斷啓喑應該是 1975-1976 年間倒閉的三所聾校的其中一所。
13. 社會福利署的年報由 1962 年起有記錄香港聾啞協會學校的學生人數，《香港年鑑》在 1962-1969 年間有聾啞協會學校（東區及西區分校）的記載。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1987）訪問了有份成立聾啞協會學校的聾老師譚良瑜，他說擔任了教務 6 年，而 1970-1971 年教育署的年報稱當時聾校為七所，比 1968-1969 年社會福利署年報所載少了一所。綜合各方資料，我們推斷這段時期結業的應該是聾啞協會學校。
14. 據《路德會啓聾學校特刊——新校奉獻典禮》記載，該校開辦時名為路德會望覺啓聾學校，至 1990 年搬往葵芳新校舍時改名為路德會啓聾學校（路德會啓聾學校，1991）。
15. 據《明愛達言學校——20 週年紀念特刊 1973-1993》所載，該校開辦時名為嘉諾撒達言學校，1991 年改名為明愛達言學校（明愛達言學校，1993）。
16. 《路德會啓聾學校特刊——新校奉獻典禮》在學校發展簡史中寫道：「〔1974-1975 年〕私營聾童學校相繼關閉，本校迅速擴展，收容失學聾童」及「本校租用九龍又一村協同神學院部分院舍擴班，共開辦小學 20 班」（路德會啓聾學校，1991，頁 51）。在 1974-1975 年前，啓聾只有五班，增幅達三倍。另外亦有受訪者表示，達言學校接收了不少曉莊學校和聾童會的轉校生。
17. 原文為“The aim of special education is to educate handicapped children in the same way as ordinary children whenever possible”，中文翻譯由作者提供。
18. 所謂弱聽班，是在健聽學校加插特別班，聽障學生在自己的班內學習主要科目，非學術科目和課外活動則和其他一般學生一起進行。政府曾經在一所政府小學和兩所中學的小一至中三班級開辦過弱聽班，自 2000 年起逐步停辦。
19. 2010 年真鐸學校和啓聾學校約有一百多名學生，其中真鐸已轉為主流學校，只剩下中學部仍有未畢業的聾生，至於啓聾則因為收生不足而面臨縮班。
20. 政府統計處（2008）的《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料——第四十八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指出，全港約有 92,000 多名聽覺有困難人士，其中聽覺受損程度方面，約 10% 為完全失聰（佔整體人口千分之一），另外約 26% 的人佩戴助聽器後聽力可能有改善。在這九萬多名聽障人士中，15 歲以下的佔 1,500 人。由於只有 176 人入讀聾校，因此推算出有過千名聽覺受損的學童入讀了主流學校。



21. 現時在美國，口語及手語教學分別佔聾人教育的 52% 和 46%，聾童可以按其聽障程度及溝通需要，選擇合適的學校 (Gallaudet Research Institute, 2008)。
22. 事實上，直至目前為止，並沒有科研證據證明聾童使用了手語會影響他們日後的口語或其他方面的發展。相反，有愈來愈多研究證明了儘早學習手語有助聾童的學習和社交發展 (Marschark, 2007, p. 65)。
23. 路德會啓聾學校也曾一度使用暗示性發音手形。暗示性發音手形是指輔助聾人唇讀口語時使用的特定手形和動作。口語中有不少聲音難以透過嘴唇的動作來區別，例如“c”、“e”、“g”和“z”的嘴形分別不大，暗示性發音手形就是要把原本看不出的聲音區別用手形和動作在嘴的旁邊顯示出來 (Marschark, 2007)。暗示性發音手形並非手語，亦非聾人教育界的主流教學法，例如在美國，只有 0.2% 的聽障學生使用暗示性發音手形，因此本文不會對此深究 (Gallaudet Research Institute, 2008)。
24. 有一位受訪者跟我們說：「上課的時候，如果老師看見我們打手語，就會用木尺打我們的手。」
25. 《真鐸啓聾學校鑽禧紀念特刊：1935-1995》記載了 1935 年至 1995 年宿生及走讀生的人數比例 (真鐸啓聾學校, 1995, 頁 83)，學生人數在 1935 年有 6 位，1948 年有 12 位，1953 年有 68 位，1958 年有 114 位，所有學生都有留宿，1968 年開始有走讀生，但當年 130 名學生中仍有 95 人住宿，比例達 73%，70 年代留宿生比例才大幅下降。
26. 據真鐸啓聾學校曾住宿的受訪者說，留宿的學生只會在數個大節日回家探親，平時一星期七天都留在宿舍。
27. 據復旦大學龔群虎教授的觀察，老一輩的南京及上海聾人所打的手語非常接近，分別不大 (龔群虎, 私人通訊, 2010 年 6 月 29 日)。
28. 香港聾啞協會成立於 1955 年，是香港最早成立的聾人組織。
29. 「手口語」的意思是一邊說話一邊加上手語詞彙，手語的多寡因人而異；手語數量少聾生固然看得不明所以，手語數量多聾生亦不一定完全明白，因為手口語的句子文法仍以口語為主，如果聾生對口語文法認識薄弱，很可能只會一知半解。

### 參考文獻

- 明愛達言學校 (1993)。《明愛達言學校——20 週年紀念特刊 1973-1993》。香港：明愛達言學校。
- 政府統計處 (2008)。《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料——第四十八號專題報告：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香港，中國：政府統計處。
-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1987)。《香港手語源流及發展》。香港：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2009)。《人工耳蝸二十週年慶祝聚餐》。擷取自 [http://www.deaf.org.hk/documents/newsletter/2009/1209/ci\\_lunch.php](http://www.deaf.org.hk/documents/newsletter/2009/1209/ci_lunch.php)
- 真鐸啓聾學校 (1985)。《真鐸啓聾學校金禧紀念特刊：1935-1985》。香港：真鐸啓聾學校。
- 真鐸啓聾學校 (1995)。《真鐸啓聾學校鑽禧紀念特刊：1935-1995》。香港：真鐸啓聾學校。

- 啓聾學校 (2006)。《啓聾學校紀念特刊：1960-2006》。香港，中國：啓聾學校。
- 華僑日報 (1950-1992)。《香港年鑑》(第 3-45 回)。香港：華僑日報出版部。
- 路德會啓聾學校 (1991)。《路德會啓聾學校特刊——新校奉獻典禮》。香港：路德會啓聾學校。
-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Government. (1982-2009).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Educ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Government. (1961-1972).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Annual summary*.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Gallaudet Research Institute. (2008). *Regional and national summary report of data from the 2007-08 annual survey of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children and youth*. Washington, DC: GRI, Gallaudet University.
- Groce, N. E. (1985). *Everyone here spoke sign language: Hereditary deafness on Martha's Vineyar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osjean, F. (2001). The right of the deaf child to grow up bilingual. *Sign Language Studies*, 1(2), 110-114.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54-1964).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77). *Integrating the disabled into the community: A united effor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Johnston, T., & Schembri, A. (2007). *Australian Sign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sign language linguistic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e, H. (1984). *When the mind hears: A history of the deaf*. New York, NY: Vintage.
- Lang, H. G. (2003).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deaf education. In M. Marschark & P. E. Spencer (Eds.), *Oxford handbook of deaf studie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p. 9-20).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schark, M. (2007). *Raising and educating a deaf child: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choices, controversies, and decisions faced by parents and educators* (2nd e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nghas, R. J. (1997). *An "unspeakable, unwriteable" language: Deaf identity, language and personhood among the first cohorts of Nicaraguan signer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New York, U.S.
- Senghas, R. J., Senghas, A., & Pyers, J. E. (2005). The emergence of Nicaraguan Sign Language: Questions of development, acquisition, and evolution. In S. T. Parker, J. Langer, & C. Milbrath (Eds.), *Biology and knowledge revisited: From neurogenesis to psychogenesis* (pp. 287-306).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Smith, W. H. (2005). Taiwan Sign Language research: An historical overview.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2), 187-215.
-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Hong Kong Government. (1948-1979). *Hong Kong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Social Welfare Officer*.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Winzer, M. A. (1993). Educ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 deaf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Toronto, 1870–1990. In J. V. Van Cleve (Ed.), *Deaf history unveiled: Interpretations from the new scholarship* (pp. 127–145). Washington, DC: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 Woodward, J. (1978). Historical bases of American Sign Language. In P. Siple (Ed.), *Understanding language through sign language research* (pp. 333–348).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 Woodward, J. (1993). Intuitive judgments of Hong Kong signer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sign language varieties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CUHK Papers in Linguistics*, 4, 88–98.
- Yung, K. K. (1997). Speci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s history repeating itself? *Hong Kong Special Education Forum*, 1(1), 1–19.

### Early Dea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Origin of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Felix SZE, Connie LO, Lisa LO, & Kenny CHU

#### 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existing documentation and conducting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reconstructs the history of dea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n the early days, investigates how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was related to the language policies of different deaf schools, and finds out deaf people's view on the issue of medium of i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ormal dea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began in 1935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deaf school. Although that school prohibited the use of signs, deaf children spontaneously developed a gestural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among themselves due to the pressing needs for communication. This gestural communication system can be viewed as an early form of sign language.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e number of deaf schools gradually increased. Some of them introduced the Nanjing/Shanghai variety of Chinese Sign Language, which influenced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Through our interviews, we found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deaf interviewees, whether they graduated from oral or signing schools, felt that the use of sign language could enhance their learning and that if they could turn back time, they wished their hearing teachers could use sign language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Keywords:** education of deaf childre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medium of instruction; origin of sign language

## 教師情緒政治之探究： 台灣一所國民中學之個案研究

陳幸仁

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

許惠茹

台南市立善化國民中學

教師是學校組織成員，不論在處理工作任務或與人互動時，都會產生各種情緒經驗，情緒於是成為教師學校組織生活的一部分。過往，在有關教育組織的研究中，甚少探討學校組織情緒這面向，但它卻值得關注。本文以台灣一所國民中學為個案，探討學校組織情緒，以及教師面對組織情緒會呈現甚麼情緒政治。為了深入了解教師在學校組織內的情緒，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及觀察等質性研究方法蒐集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組織情緒規則，往往規範學校成員的情緒，形成教師情緒勞務與情緒疏離；再者，教師反思其情緒能使他們覺醒其意識，並能把意識轉化為行動而替情緒發聲；最後，學校教師會為追求教師專業自主，能推翻舊有學校情緒政體，建構同僚專業互享機制，並累積正面的情緒知識。領導者若能適當重視教師組織情緒，可增強教師對組織的歸屬感。

**關鍵詞：**情緒政治；情緒勞務；組織文化；組織情緒規則

### 探尋情緒呼吸的窗——前言

近年，全球化教育改革風潮不斷衝擊台灣教育界，教師要面對更大的工作挑戰（陳幸仁，2005）；而台灣一波接一波的教育改革浪潮，亦加重了教師的工作負擔（楊巧玲，2007；Hargreaves, 1994）。其中，教育改革對於需否重塑學校組織文化有相當大的影響（鍾添騰，2004）。陳幸仁（2005）指出全球化教育改革風潮所及，學校組織的權力結構逐漸從金字塔式轉為扁平式，其中教師會得以在學校成立，能與以校長為首的行政人員協商，有助教師參與校務決策，大大提升教師在學校組織裏的權力。